

不灭, 征而不服。在美“一超”相对走下坡路的同时, 世界其他力量却相对上升, 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超”和“多强”(1+X)的关系,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第五, 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 但其两面性将进一步突出。近 20 年是全球化发展的高峰, 在全球化过程中, 以美英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虚拟经济迅速扩张, 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几乎等同美国化。经济全球化使全球金融投机的消极后果影响扩大, 促使金融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另一方面,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 各国彼此成为“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伙伴”, 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日益加深。今天各国共同面临的不是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传统敌人, 而是赖以生存的经济秩序, 其严峻性、毁伤性、破坏性前所未有。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应付, 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正在成为各国发展合作关系的新基础。在全球化这条船上, 要想不被海啸吞没, 就得同舟共济, “通力合作, 共度时艰”。

第六, 中国在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尽管这场金融危机也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 但程度要比其他国家轻一些。一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尽管中国增速放慢, 但在全世界呈负增长的情况下, 即使是 8% 甚或 6% 的增长率也是十分抢眼的。在全球经济危机下, “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信贷危机或信任危机的大

国”。二是中国具有支撑经济持续发展充足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到 2008 年底, 中国企业和城乡居民储蓄总量为 45 5 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内银行总资产超过 61 万亿元人民币, 资本充足率达到银行总资本的 99.5%。中国还有高达 1.95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居世界第一。三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升级、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等三大升级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 城市化率离 57% 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将新增 1500 万城市人口, 带动 1200 多亿元人民币的城镇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城乡市场不仅规模巨大, 而且是一个成长中的、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市场。伴随城市化进程, 消费结构也将随之升级。中国市场将是中国发展的终极优势。当前中国面临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并促进东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历史机遇。中国政府最近出台拉动内需十项措施和产业振兴十大规划, 将有力推动这个进程。产业结构的升级将释放巨大的活力, 进一步撬动经济总量的提升。最后, 中国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中国是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 中央政府在极短时间内出台力度空前的财政扩张政策, 其资源动员的效率令人叹为观止。

只要政策得当, 同心同德, 中国不仅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走出危机, 而且可以化危为机, 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积极展开全经济球布局, 拓展国家利益,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全球战略态势。○

未来趋向: 多元货币体系与多强政治格局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中心主任 教授)

现在分析金融危机对未来世界体系的影响, 就像坐在变速移动的车子上要击中变速飞行的靶标, 带有双重的不确定性。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之中, 从广度看正从美欧等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向边缘国家和地区扩散, 从深度看也在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和社会其他层面渗透。可以想见, 正在向外

围国家和实体经济蔓延的危机, 最终还将反过来再次冲击金融。在危机还在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一味去猜度危机的结果, 而是把握变化的基本趋势。

首先, 金融危机不但会影响全球经济, 也将导致全球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这次危机与二战后的历

次金融危机不同,它不是倒闭几家银行,波及几个国家的危机,而是整个西方金融体系塌方引发的一场全球范围的综合性危机。这场危机已对全球实体经济和社会各阶层造成了严重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国力量对比,促使大国关系出现调整和变化。小布什总统同意召开华盛顿 G20 峰会,标志美国被迫放弃单边路线的开始,而奥巴马总统在参加伦敦 G20 会议前发表《全球共同行动的时刻》的文章,则表明美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抗击危机。不只美国,国际政治舞台上呈现出许多新动向,如欧俄之间在寻求建立“欧洲安全新框架”,而美国智囊机构提出“G2”概念等等。这些背旧盟、结新盟迹象,标志着国际政治格局正酝酿重大变化。

其次,大国关系目前是合作大于争夺,但从长期趋势看冲突难以避免。由于目前各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救急,主要精力集中于拯救经济和稳定社会,希望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因此在刺激经济、加强金融监管、反贸易保护、改革金融机构等议题上比较容易妥协。从伦敦 G20 会议的情况看,在危机没有进一步扩散之前,各国仍将可能继续合作。但美、欧、中、日、俄等国和国家集团在协调应对危机的立场、推出救市方案的同时,也在争夺危机责任话语权。以法德为代表的“莱茵资本主义”希望通过对“英美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自己的道德优势,进而掌握未来世界体系重构和全球治理的主导权。这种模式之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抗。对抗出于本能,而合作需要认同。目前全球缺少共同的价值观,国家间利益难以通约和让渡,难以形成全球性的合作机制。美国霸权正在瓦解,而霸权后秩序尚未建立,从历史看,建立秩序的时期往往充满竞争与冲突。

第三,大国争夺的焦点集中在由谁主导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制度是未来全球秩序的基石,也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对握有全球货币霸权的美国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维持现有的货币体系,但在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现存金融模式广受诟病的压力下,美国也同意对货币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而一些国家和机构则主张彻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先前以蒙代尔提出的“世界货币”方案最具影响力,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新近提出的“超

主权货币”方案则更加激进。与上述保守与激进构想不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和伦敦峰会上提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所谓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就是要摆脱过于依赖美元的现状,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实现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机制,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货币体系多元化较单一的美元本位制更加公平,运行也更为稳定,能够更平衡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利益,也可能避免大国关系的正面冲突,防止引发国际政局的激烈动荡,是较为可行的方案。

第四,未来国际政治走势将向多强格局发展。尽管现在说此次的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一超多强”世界格局尚属太早,但从趋势上看,全球格局将发生巨变的征兆却日渐明朗。其中最鲜明的标志是美元本位制已被撼动。美元本位制是美国保持“一超”地位的基础,美国维持独步天下的军事、科技和金融力量,都来自美元本位制的支撑。与美国力量式微同步,近年来在全球舞台上出现了新兴国家集团,导致国际力量强弱对比发生重大改变。首先是具有了统一货币的欧洲,再就是涌现了中国为龙头的一大批制造业国家,还有不容忽略的“欧佩克”等资源类国家。尽管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但两次 G20 峰会已经证明,美国已经无法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继续实行单边主义,这意味从冷战后保持至今的一超格局正在改变。如果说,取代美元本位的将是多元货币体系,那么与之相应,取代美国一超格局的将不是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诸强并存的多强格局。

第五,近期可能出现泛欧和泛太平洋两个币缘圈。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难以一蹴而就,在近期可能出现的是围绕目前的全球主要货币形成两个币缘圈。一个是主要使用欧元的泛欧币缘圈,包括欧盟及俄罗斯等主要欧洲国家;另一个是使用美元的泛太平洋币缘圈,主要包括美中日和主要石油输出国。币缘圈作为在一定地域内围绕一个核心货币形成的具有广泛利益的共同体,是一个存在资源地、加工产

业区、制造业地区、科技与金融服务区等相对完整,同时有一定垂直和水平经济分工的经济体系,因而有可能成为全球体系中超越国家的新主体,构成全球体系中新的力量极。就像欧元区已经表现出的共同利益取向一样,美元圈也出现了进一步整合的趋

势。最近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国”概念,尽管其中有故作惊人语之嫌,但亦透露出雨近则础润迹象。

在这场旷世危机的冲击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重大变化。及早认识变化趋势,对于我们意义重大。○

金融危机与社会变革

杨明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 研究员)

此次金融危机其实是国际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突出表征,也可以说是复合性社会转型危机中的重要一环。此轮复合危机的多种症状已经或即将在社会、政治、经济、安全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全面显现。国际社会在经历较长时间的痛苦调整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市场经济秩序将进一步理顺,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各类管理机制也将得到改善与健全,大国关系步入相对稳定的新格局,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亦将有新的定位。

从 20 世纪以来的国际社会发展轨迹看,重大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总是伴随着社会与国际关系层面的剧烈动荡与变革。金融危机不仅不是社会危机中的孤立现象,而且与恐怖主义活动、街头运动、大国力量消长和国际秩序重塑等因素一同构成某一重大时期社会变革的历史画面。人类在 20 世纪所曾经历过的 1929 年大萧条和 80 年代的金融危机等两场重大危机与 21 世纪之初开始的这场危机确有许多“惊人相似的一幕”。这些相似场景不仅仅体现在股市暴跌、银行破产、市场萎缩、就业艰难等经济领域,也体现在社会、政治及国际关系等诸多非经济层面,其中较为突出的首先是恐怖主义活动。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的大萧条前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恐怖活动出现了第一次历史高潮。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也曾昙花一现,1937 年国际联盟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反恐公约。20 世纪 80 年代金融危机之前的 60-70 年代,以极左势力为代表的国际恐怖恶潮高涨,而从“9·11 事件”到现在,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也在加紧搭建全球化网

络。其次是街头政治。大萧条前后的西方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示威与罢工被视同寻常。20 世纪 60-70 年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法国“五月风暴”和美国反战示威与游行等街头政治现象。此轮金融危机前后,世界范围的街头运动似乎再达沸点。不仅发达国家街头冲突不断,一些原本平静的发展中国家也接连出现街头暴力政治事件。再次就是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大萧条前后格局变动是以极端的世界大战形式体现,20 世纪 80 年代金融危机前后国际战略格局出现诸多大的变化,如西方阵营离心倾向与欧日力量的跃升、第三世界力量的全面兴起以及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时至今日,在危机出现之时,一些有关战略格局变革现象再次引发世界性关注,如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美国实力地位的不确定性等。而且即使是经济领域的危机也不单单体现在金融层面,20 世纪所发生的两场危机和本世纪的金融危机前后,也出现了能源与资源危机。

如此等等经济与非经济现象的高相似度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重大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意义。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现代意义上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在某一历史时期超越了国家与国际社会现行机制的管理能力与执政理念的反应力,而资本在国内外的急速扩张必然导致社会资源与利益结构的重新分配。市场发展的自发性力量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形成极大冲击,各种社会与国际关系问题也就纷至沓来。如同 20 世纪曾出现过的重大金融危机一样,目前我们面临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与市场管理的危机,